

经世济民的民俗学

陈勤建

(华东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民俗学, 虽然因它的研究对象民俗——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内容的丰富广泛, 而形成价值诉求的多元化, 但是, 综观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成功经验, 归根结底, 经世济民是民俗学科的最本位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 民俗学, 经世济民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一门学科能否对社会有用, 直接影响着它的生存和发展。民俗学在今天中国也正面临这样的检验。民俗学, 虽然因它的研究对象民俗——传承性的生活文化——内容的丰富广泛, 而形成价值诉求的多元化, 但是, 综观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成功经验, 归根结底, 经世济民是民俗学科的最本位的发展趋向。

—

民俗学科的经世济民, 从外在因素而言, 是本国学术传统使然。中国民俗学奠基者钟敬文先生生前强调: 民俗学是一国的民俗学。民俗学科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 但它研究的内容和学术倾向, 总是受到不同国家的国情的制约和学者选择的影响。

在我国, 学问强调经世致用, 源远流长。《礼记》《大学》篇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 意诚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观念的经典表述, 一直为我国传统文化所提倡, 并与时俱进。北宋时期, 由张载则进一步将经世观念与“治事”之学相兼: 提倡“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精辟地概括了我国文化执著的经世济民精神。虽历经千年, 却始终延绵不绝

现代中国民俗学, 就是在这种传统经世济民学术精神感召下, 向西方求索引进的新学问。民俗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中叶, 比文化人类学出现要早 20 余年。我们中国, 对民俗概念的感悟和知觉, 文字记载也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但从学科认识它, 却是从 20 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其始作俑者是周氏兄弟, 周作人和鲁迅。20 世纪初, 在中国, 力图用西方民俗学经世济民的人不仅仅是周氏兄弟, 活跃在当年文坛上的文、史、哲、各学科名流专家、学者教授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兼士、常惠、钱玄同、顾颉刚、钟敬文、江绍原、杨成志、容肇祖、姜子匡及朱自清、闻一多、茅盾等或遥旗呐喊, 或身体力行, 纷纷投入其间, 其阵营之强大, 在中国民俗学史上, 乃至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20 世纪中国学界发展民俗学科的思考和行动, 之所以能发生, 除了上述倡导者和名流学者们鼓吹宣扬、积极投入之外, 还得力于清末民初, 严复等爱国志士为“富国强民”, 向西方寻求“经世济民”方术, 来改造国民性主张的滥觞。

严复(1853-1921), 是我国近代史与现代史交替中一位重要的思想启蒙家。生在清季国势颓败的严复, 既有深厚的国学传统, 又西渡留洋, 摄有欧洲的文明思想。面对政府的

腐败无能，西方列国的持强欺弱，频频侵略，悲壮而凄凉。为“保种保国”他在《原强》中依据斯宾塞《教育论》中“力”、“智”、“德”的三要素，提出了“民德”、“民智”、“民力”的基本概念来实现他的“救亡”理想。在西方文明，社会契约论及国民观的影响下，他认为国家富强的根源在于“民”。国民是国家强盛、民族独立之“本”。故强调要对国民实行启蒙教育，提高“民”的素质，他以为，若民质低下，即使圣人出现，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政策，“一人治百所不和”，仍无法见效。严复的国民观，是依据儒家“民为贵”的观念来诠释欧洲文明中的国民理念，故侧重点，不在于个体的民，而在于一种集团的“群”概念的民。提高民质，也就是提高群体的民众素质。他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他把他的“三民”理论，作为强国的关键性方针和政策，竭力鼓吹宣扬，一时在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对转型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严复后期思想趋向保守，但他以民为本，富国强民的革新主张，久久回荡在中国大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生活在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严复“三民”国民观的启蒙教育。直到解放后，由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三好”学生的标准，内涵上，是以严复“三民”思想教育标准为基础的。“三民”思想在 20 世纪初的学界为人所熟识。而民俗学之后之所以在当时被学界不同学科的人所共识，所认同，与这“三民”思想有着学理上的一致和内在的天然联系。因为民俗学之“民”，就是群体的民众，国民之民，它所研究的“俗”它本身就是一国民众——民力、民智、民德生活经验积累的学问。而且是一门道地地专门搜集、研究民众知识智慧的学科，可以广泛运用到现实中的“民学”（江绍原《关于 Folklore, Volkskunde 和“民学”的讨论》见《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附录七”上海中华书局印行，1933 年 6 月）。

20 世纪初，中国民俗学学科意识的发生，就是建立在对民俗知识的理解和“强民”理念之上的。从今天的学术眼光衡量，这种理念与民俗学的实际学理有着差距，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满怀热情，鼓吹民俗学。当年，中国学界大力倡导、互相推崇民俗学的一些大人物未必清楚民俗学真正的学理学识，经世济民的学术传统促使他们情不自禁的呼唤民俗学在中国的诞生。

二

民俗学“经世济民”的学术关注，从内在因素而言，应该是该学科本身的学识所致。

民俗学，国际术语 Folklore，英文原本的文字含意，就是民众的智慧。它是“Folk”和“lore”合成而成。Folk 原指乡民、农民，今日理论界扩展为民众。而 lore，即为知识、学问。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原美国民俗学会主席，《世界民俗学》一书的作者阿伦·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自一八四六年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最早使用了民俗学（Folklore）这个词语以来），关于民俗学定义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过。很多定义侧重在“知识”（lore）方面，也有一些侧重在“民众”（Folk）方面。关于“知识——是着重在民俗学的资料，而不是着重在使用这些资料的人——的介绍，曾涉及它的起源、形式、传承以及作用”。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学科的定义不免有歧义，但是，总的倾向，还是明确的，就民俗学而言，主要是有关人民知识的学问。

民俗的事项是民众生产、生活知识、智慧、经验的展演，民俗的研究也就攸关“经世济民”，成了认识民生，关爱国家不可缺少的社会需要。

日本民俗学界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知。日本现代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 在晚年和关敬吾共同撰写的《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文中追索道：“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认识祖国和认识自我，它的意图是站在自然共同体的立场上来研究民众的传承生活样式。但是，

各国研究者最初的动机与目的并不一致，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势。德国的民俗学始于格林的文献学研究。民俗学的研究内容、范围都是由该国资料状况所决定的。”日本“民俗学研究的根本动机源于热爱祖国、了解民众。除了民俗学，可以承担这样任务的科学还有很多，而民俗学则是应用独特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新的科学。它主要是把历史学所舍弃、忽视的部门作为课题，而以此为基点”，研究“我们祖先的生活样式、思维方法。感觉方法和生活技术。了解这些都是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而发展至今，对现在的生活还有什么作用。活样式发生演变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法则乃至因果关系。要对此加以阐明，既是乡土研究最初的愿望，也是现在民俗学的任务。”（王汝澜译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但是，现代中国学界对民俗学内在天生具有经世济民的知识，由于多种因素，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认识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经钟敬文、顾吉刚、杨成志、杨堃等老一代学者的上书呼吁、提倡，沉寂数十载的中国民俗学终于重新浮出水面。20多年过去了，如春回大地，发轫于五四前后的民俗学科又迎来了蓬勃发展的艳阳天。一些大学相继开设了民俗学的课程和设置了相关的专业、研究的学社。全国各地的民俗调查和民俗活动，犹如山花烂漫。然而，民俗学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为社会所认同的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在总体上，它仍处在浅表、边缘，甚至无序的状态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俗学识学理观念的落伍滞后，有意无意地扼制了学科本身与现实的联系。致使百年前，先辈们为经世济民富国强民而呼唤的民俗学进步不很大。当然，这问题也不是今天形成的。

周作人于1913年在童话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民俗学”学科名谓。但是，他将“民俗学”出口转内销，从日本转购回来后，理论上没有系统地将其重新界定。当今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俗学界对此缺乏明晰的认识，因而在总的倾向上，一直停留在‘民间古俗’的学术取向上而没有进升至Folklore真正意义的‘民众知识’的学术取向上来。今天，是应当觉醒和认真加以调整的时候了。”（任骋《“从民俗”到“民识”》，《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山东大学。）作者的一些见解是很精辟的。

我国一般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对民俗学的认识，大多囿于英国20世纪初博尔尼《民俗学手册》的狭隘的民俗观，停留在无形的“民间风俗习惯”的层面上。与国际比较，滞后至少数十年。民俗学识理念的后进，有内外的因素，首先与中国传统的民俗观念有很大关系。虽然中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已懂得“彰好以示民俗”，“观风俗以察朝政”，但是，其理念与西方民俗学Folklore之民俗内涵，认知有颇大的差异。较之接受了西方的Folklore，并用汉字将其翻译成日语的“民俗学”，在涵义上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日本，表面上也用了与汉字一样的文字——民俗，可客观上已灌注了西方的学理、学识，内涵上已不等同于原汉字的“民俗”。可在思维习惯上中国人常常想当然地把“日语汉字”的“民俗”与“汉语中文”的“民俗”相提并论。无意中，还是以传统汉语的民俗，取代汉字日语的“民俗”，并以此替代英语系统中Folklore的全部。殊不知，这二下转换，把两方学科理念上的民俗学已作了两次外科手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学界包括《辞海》都把民俗视同“民间风俗”的缩写。风俗与民俗混为一体，等量齐观。在日本，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引进后，日语汉字“风俗”与日语汉字“民俗”就明显分了家。“风俗”在现时的日语中已成了“风流”，“风俗”成了带有红灯区的代名词。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风俗，在柳田国男的分类中，仅是民俗的一个浅表层面——生活技艺中的一个方面。在日本，生活技艺这个层面所包括的内容，除了中国传统风俗意义上的四时八节，生养嫁娶，殡葬习惯，还包括衣食住行，生产工具、传统工艺等等。如果再加上另外二个层面口承语言，心意诸现象，其民俗的内涵，从无形到有形，从言行到心理，囊括了民众传承性生活的各个领域。

所以，什么是民俗？民俗并不是一些外行人望文生义而衍生出来的陋民、乡民的文化

垃圾。其间包括了千万年以来，生于斯，长于斯，依附于斯的人们所积淀的生命、生活中的宝贵经验。（参见陈勤建《中国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民俗的表层是一个族群传承性的生存经验、智慧的结晶。在生活层面表现为生活的技艺和生活习惯。表现为社会民众群体风行的不成文的程式化的行为规范和文化模式，一种活世态的生活相，或生活场，生活流。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细节都和民俗分不开。

从深层结构看，民俗是一个族群独特的，特有的，思想文化的起点和思考的原型。常常不经意地流溢在我们人类每个人的日常言行、器物和观念中。民俗归根到底是“人俗”。如果说我们一个人有生物的生命，那么我们也有文化的生命。人是生物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双重复合体。如果生命的基因是DNA，那么文化的基因就是从哲学理念上的民俗。

总之，民俗学对于国计民生有着重大的天然联系。经世济民是其内在必然的学术走向。

三

民俗学科的经世济民，最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其研究和发展要真正切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切合，更多的应是学科本身主动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日本民俗学界本身不拘泥于西方学理的框架，从社会现实需求出发“经世济民”，进一步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现代化经济文化发展中，显示了独特的力量。

20世纪初的日本，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现代工业生产在飞速建立和发展，日本传统的农业和民族文化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西方文明民俗学学科的影响下，学术界也有学者，盲目地跟随西方一些人，如调查殖民地陋习一样对待民众的民俗：对传统民俗不进行分析，一概视为随俗恶习加以否定。当时，因工作关系经常深入农村的柳田国男，接受西方贡姆民俗学的学科理念，却对民众在长久传统生活中所创造的民族基层文化——民俗，予以特别的注意和关照，从中发现了它之所以生成传承“经世济民”的积极意义。

先进的西方工业技术产业和农业技艺的引进，日本传统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稻农为主的农业文化受到了巨大的震荡。然而，这是不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终结？数千年来，伴随日本人一起发展到今天的民间生活习尚，是不是已经一无用处，拱手让位于全盘的西化？我是日本人，我怎么会这样？我将来该如何发展，带着这种种的思考，柳田国男与日本民俗学的一些先行者，走向当时日本社会最广大的农村采访，与农民促膝谈心，全面展开“乡土研究”名称的民俗学资料搜集和研究。极力“要对日本民族生活的一切方面的一切现象进行根本的研究”（（日）《乡土研究》创刊号高木《乡土研究的本领》1913）。为了贯彻这些意愿，柳田国男还专门在创刊号上撰写文章，具体阐明乡土研究的科学目的与实践的方法。具体是：1、阐明各个乡土地区的民众生活怎样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规律，怎样使村落居民幸福地生活。2、乡土研究和历史学的共同点是要对文化进行历史的分析。但通过文献学无法了解日本的民族性，因为日本文献中没有平民的历史，历史是由贵族豪杰的列传组成的，政治与战争是历史的主流，即使有一点关于民众的记录，也是被草率处理的。因此，民俗学研究的与一般历史学有所不同。3、为了弄清民众的生活，思想变迁的过程，要摆脱过去的史学方法而采取新方法，即实地采集资料，重视比较研究。

柳田国男在早年的《乡土生活研究法》一文中谈到，日本社会的现实“农民为什么这么贫困的根本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而鲜明地提出了“学问救世，‘经世济民’的主张”（《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5卷327页）由此，他突破了英国早期民俗学的界说，注重民俗与生产和生活关系的梳理和其间的经验智慧：如早期的山村生产，狩猎方法和狩猎生活的变迁等。二战后，关于工具制作、使用方法等技术系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从而奠定了日本民俗学经世济民的基本学术走向，成为日本国内家喻户晓，影响极大的国学，并扩散

达到其它学科领域,将民俗学引进到生活和生产各个领域,渗透进日常衣食住行以及工农业、贸易等生产经济活动中。有力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

率先采用技术比较论,并长期用此法从事日本和各国发展技术经验研究的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在《日本的技术——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好的成就》一书中认为,支持日本经济起飞的有二大支柱:西方技术的采用及其用传统民俗文化对西方技术消化改造为日本式技艺。后者,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柱石。

对此,他在所写的专著中作了详实的论析。他认为,“在日本工业中,重点放在生产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用日本旧式的武士在前线指挥作战那样培育出来的精神。工人专心致志地奋战在生产线上,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伴们为自己而流汗和并肩战斗,而不是为经理们工作……在日本的精致的高性能的工业产品中,依然能体现‘盆栽’和‘坠子’的精致小巧的传统工艺和艰苦的创造精神。这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与日本当代技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作者认为,日本传统的武士和以武士为中心的民俗气质,决定了日本现代化工业生产中,第一流的人才大量率先进入生产线,如旧式武士一样,在实践第一线的生产拼搏中,发挥他们的才智,支撑日本技术力量发展。日本在千百年来的军事统治下,武艺比智力成就更受尊重。武艺的基础是体力,将军们为保持武艺高强,总是带头训练。在这种武士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民俗的心态观念:满头大汗,亲自动手干是一种美德,由此带来的价值观念渗透到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至于产生于农民的武士阶层,更难使他们轻视体力劳动。作者认为,今天的日本企业继承了这一民俗传统,有才华的大学毕业生,首先不是留院校、进机关,而是进入公司企业。其中大部分一开始即分配到直接从事生产或销售的部门,很多最有才华和精力旺盛的专业大学生或雇员通常被派到生产车间,以“武士道”精神强化生产第一线。今后的企业管理人员、经理、总裁,通常从这些“生产第一线”的有文化的“武士”中选拔。作者在调查后认为,日本大学毕业生,在企业中部分院校高低,他们与进厂的一般工人一样,一开始都要安置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就看你在实践工作中能力的大小一定升降。一进入公司,每个新雇员都有成为总裁的机会,这样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在美国,著名管理学院的毕业生可以直接成为经理人员,以致总裁,但这类快车道对声誉较差的管理学院毕业生。即使是出类拔萃者,一般也不开放。在法国,绝大多数总裁来自公司创建者的家族成员,或者来自在政府内具有较高地位的官吏。在欧洲,等级观念很强,一个没有家族关系和地位的人,是很少有机会成为一个大公司总裁的。在中国,作者认为与日本正相反,生产线的地位甚低,中国传统的官僚统治观念赋予脑力劳动以绝对优先地位,而对体力劳动则蔑视为下贱和粗俗,通行的是一种“儒生”风尚,有才华的技术人员显然并不被输送到工厂里从事实际生产。“最优秀的理工科毕业生被各工业部录用,或成为大学教师和国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次一等的毕业生则被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员。只有经过这番筛选所剩下的那些没有多少才华的毕业生才被输送到有实际可干的工厂”。“中国的企业也是有能干的技术官僚所经营,他们虽受过理工科的训练,但没有生产过程的第一手经验。”中国的技术人才,“从大学入学考试之困难以及毕业生的使用方式和分配的职务上,都是人回忆起古老的科举制度。”作者的论述,不免有偏颇之处,但无可否认,在我国确实存在如他所说的传统弊端。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克服陋习,发扬良俗,为现代化生产服务的重要性。

一种先进的生产工艺,只有同一国的实际国情与民俗风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效益,这是各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约而同认识和遵循的一个规律。日本企业大锅饭式的终身雇用制的功效并不比主张个人才干自由雇用制的美国差。后者似乎有较大的自由度,但也带来了对企业生产漠不关心的临时观念,影响了技术的正常发挥。1980年,日本的汽车销量一跃而超过它的老师——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说:“我们的设计比谁都不差,但我们没有日本那样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工人。”日本丰田等汽车大企业,将传统的终身雇用制提供稳固的工作保障为坚牢的经线,把新技术作为纬线织上去,产生了日

本式的生产力，带有很浓烈的民俗色彩。终身雇用制从日本传统中可找到根源，它是江户时期（公元 1603—1868）遗留传承下来的。当时德川幕府管辖下的半自治的封建领地体系统治日本，这些封建领地就是终身雇用制的原型。领地政府由家臣、侍从所组成，终身供职，以其职务取得俸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体制以终身雇用制的方式戏剧性地再生了。这种体制并不是没有竞争的制度。它又与日本民俗本质文化中的“团体精神主义”（或称：集团主义）风尚联在一起，内部竞争，对外一致，把企业的发展与个人命运前途绑在一条船上，这样产生的能量无疑是很高的。以日本为首，南朝鲜、新加坡等东方民俗文化圈内的一些地区和国家，经济上迅速崛起，奥秘何在？有些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眼睛光盯着某种技术、某种工艺设备的更新，就是不想想这些先进的记忆设施，是在什么状况下被他们吸收消化、推陈出新的，秘密就在这里。金钱买到的仅是现代化的技艺而不是现代化的经济。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还需要人——受本民族传承的民俗文化约束的人们去掌握、操纵。先进的技艺也只有与当地生产组织形式中的良速惯制消融一体，才能激发出真正巨大的生产力。日本经济起飞的缩影——丰田企业的成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84 年，它是日本企业单位赢利突破十亿美元大关的二家之一，它的成功，除了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大工业生产外，更重要的是采取了与欧美不同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先进的企业管理。主要表现在貌似大家庭生产式的终身雇用制，一种将西方现代化科学管理和传统加组织的生产组织——民俗形式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日本式的管理方法。它一方面采纳西方产权继承法，没有一定的专业技术训练和知识，即使是儿子也不能随便继承全部产权和经营权；另一方面又把资产分成众多的股份，鼓励工人入股分红，参与经营。一方面重视专家对生产技术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又鼓励工人随时提出生产的改革建议，并额外给予一定的奖励。工厂还对工人的婚姻恋爱给予相助，尽量在本企业中为未婚者物色对象，以稳定工人的情绪，家庭的团结，推动企业的生产。很多的研究介绍丰田的文章，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下面的事实：企业的工人形成了新的观念，丰田就是我的家，我是其中的一员，为丰田干就是为我干，丰田蒸蒸日上，我就飞黄腾达。工人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企业上，爱厂如家，干丰田的活，坐丰田的车，积极为丰田的发展出谋划策。传统家族生产关系的习俗在现代化的生产领域里得到了融合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合理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即人们生产中组成的相互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受阶级利益的影响，表现出阶级关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如传统的封建经济中，除了地主和农民对立的阶级关系外，在东方国家中，常常附有宗族的亲缘关系，两者在社会生产总体中呈阶级对立的关系，但是在具体局部的事件、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上，亲缘有时会处在重要位置，而且对生产和生活发生影响。中国封建经济延续了近两千年，生产关系中的地主和农民如果都像黄世仁与杨白劳、周扒皮和长工之间的关系，那早就崩溃了。事实上，中国封建地主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经常利用宗族关系，把佃农、长工网入“家族”小一统的关系中。像旧时东北农村“吃克劳”（音）的习俗是一例。大忙季节，地主要为佃农摆酒席，一般情况下，地主还不敢掺假。秋收后，还要给帮工额外的小恩小惠，编织“一家子共富”的图景。这种习俗，形式上是为其服务的人产生一种错觉，感到是在为自己效劳一样。处于类似民俗文化圈，日本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例子，作为我们，确实应该很好地反省一下。在现代化建设中，体制的改革如何根据具体国情民情，传统的民俗机制加以更新，而不是人云亦云，一味照搬人家的东西。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工程科技一体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应用它的人群生产机制的民俗化倾向。这种倾向，甚至渗透到具体产品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越来越明显的反映在他们制造的产品上。

现代的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欧美国家首先创制的，但后继者日本却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技术加以吸收消化，使其适应日本的环境，并生产出独特的带有日本民俗气质烙印的产品。日本“小灵巧”的汽车、磁带录音机、照相机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美国和其他各国得以畅

销,要归功于日本精密的微型技术,而这种微型化的思想和技能却来自日本传统的民俗文化。森谷正规认为,日本人十分珍惜、酷爱、甚至亲自制作细致精湛的小玩意。如系在小钱袋、烟叶包上的坠子,日本称为“根付”,上面有着精巧的雕刻。其他如茶道中用的茶具上精致的手工艺品,小型精致的神坛、佛坛、神龛等。日本传统的工艺很重视用一种纤细而又注重细节表现的手法塑造出小物件,甚至日本传统式的诗人情感也赞赏精巧的小型手工艺品。在现代工业中,这种精神已经表现在以结构紧凑、重视细节、手艺精巧为特色的产品中,他们以质量及内涵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出现在爱好大型的美国、喜欢古典的欧洲,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实际上,全球现代化进程初期,先进的工业科技产品,日本原创的不多,风行全球的日式磁带录像机,第一台也是美国首创的。日本索尼公司却以日本传统民俗精巧的观念改造了它,使它微型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将老师美国和欧洲飞利浦公司远远抛在后面。令人自傲而又痛心的是,日本民族中追求小物件的精雕细做的民俗风尚,略了解一点中国工艺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师法于我们,从我们先人那儿传过去的。上海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展览,向我们展示了公元前一千年的商周青铜珍品。各种器物精致、细巧的装饰和造型,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工艺品。然而,我们先人创造的这些精美的技艺今天又流到哪里去了?在我们现代化建设中,这种民俗技艺有所发扬光大的话,何愁我们不能傲首于世界之林。而我们由于种种曲折磨难,没能很好继承,反而让邻居日本捷足先登了。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打破工商业中的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框架,勇于走向海外,投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如何实现在一点,有人总想技术装备先进点,再去国外争雄,这也是有道理的,设备技术落后先进国家一大截的行业如何去竞争呢?可是,从宏观的角度俯瞰,我们应以长治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在这方面,中国民俗的经商观念和民俗产品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观照那些用大把美元全面进口西方技术的阿拉伯产油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成为日本式的国力,便可知道传统的民俗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能量和威力。民俗及其学科在日本现实社会中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而赢得了民众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促进了学科的深入发展。

日本民俗学“经世济民”还表现在积极自动将民俗学科投入社会国民的思想教育的体系。二战后,日本将历来的修身公民科,附同历史、地理等各科内容,就成立了仿美国教育设置的社会研究科(Social Study)形式的“社会科”。社会科应开设些什么课程?教育部门的官员征求了柳田国男的意见。在学界已有相当的名声他,在教育部征求意见时,以一个关注民生现实的学者眼光,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经世济民”和学科发展的双赢机遇,即提出,把对民俗的教育和研究作为新设制社会学科的主要内涵,并告诫他的一些得力干将后藤兴善、大藤时彦、折口信夫等人在学科研究上不能随心所欲向前发展,从事学问之道的人应有点特色,渗入教育界,参予国家重建工作。事后,民俗学就进入了中小学和大学的课堂,并逐步交叉进入到文学、艺术、伦理、宗教、信仰、法律、心理、建筑等各个学科,成为日本国民性认同,大文化建设的主干课程,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教材。

客观地讲,民俗及其学科的理念,在中国民俗学界本身近百年来的发展中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其内部对学科的学识学理的认识与国际趋于一致。然而在其外部,在大人文学科领域内,由于多种因素,对此,仍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该用的,也被弃之不用,如此,民俗又怎么进入学科之流呢?今天,自诩为把握中国精英文化的人,视民俗为历史垃圾的,似乎少了一些,有时也会说几句门面的话,可骨子里对民俗的认同仍然十分低下。有一位中文教授为显示对民俗的认同,关切地对民俗学工作者说:“啊!民俗嘛,是可以搞搞的,就象一个人大鱼大肉吃腻了,要换点萝卜、咸菜吃吃,爽爽口一样的嘛,”要知道这位教授还是十分好心地讲这话的,他还想表扬一下民俗,提高周边人对民俗的不公正认识而说的话。民

俗在中国国情中要被正确地理解，也有待于学人素养和学识的提高。

在封建等级观念浓烈的中国，人分九等，历来的学问与人与文学样式一样，常被分为不同的等级。民俗学要在中国人文学科中脱颖而出，如日本一样得到真正的重视，从上之下从左到右，不克服和矫正这种封建等级的学科观念，是不行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然而令西方学者不解，令旁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对真正是人民的文化——民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老是“高”不起来呢？曾有一位欧洲的著名学者对此向我发问：在你们的眼中，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当政，但我们对民俗一类人民的文化十分关注，而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呢？他的话显然也不准确，但是，我们一些自以为是中国文化代言人的学者专家，一提到民，一看到俗，心底里升起的不是崇敬，而是蔑视。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些人中不少人还掌握着中国人文学科的话语权。这的确使民俗学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当然，中国民俗学今后的发展，关键在于民俗学自身要加强学科建设，关注学科研究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经世济民”的现实性和迫切性。作为把握民众生活文化知识智慧的民俗学，只要真正投入、融化在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一定会有光明灿烂的前景。

Useful Folklore for the Nation and People

Chen Qin-jia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ese department for foreign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What folklore care is the continuing life culture Folklore gets into much value because it has a plenty of studying object .But in a word being useful to the nation and people is the main developing road to folklore by look into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states.

Key words: folklore; useful to the nation and people

收稿日期: 2005-04-04

作者简介: 陈勤建，男，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